

名家观点

今后 10 年或 30 年要实现我们改革的预期目标,即实现“改革红利”的最大化,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,必须稳妥地逐步解决以下 6 个方面“大与小”的矛盾,或者说处理好以下 6 个方面“大和小”的关系。

# 解决六个矛盾 实现“改革红利”最大化

■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宋养琰

十八大后,中央领导在许多场合的讲话中,传递一个共同的最强音,就是“改革”。我的体会是,改革不是目的,而是手段,目的是要获取能使广大人民受益的最大红利。

其一,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的“改革红利”?

什么是红利?经济学中有明确的定义,红利就是经济在运作过程中的边际效益。通俗点说,红利是挤去水分的干干净净的利润。

这里讲的改革红利,就不单纯是经济问题,而是包括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教育、医疗、卫生等凡是能使人民受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。

回顾过去,34 年的改革红利主要表现在:它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;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崭新历程;书写了中华民族赶超时代潮流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章。用一句话来表示,改革为中华民族打造了一个今天有目共睹的人人都能从中受益的“特色社会主义社会”。

习近平同志说,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。毫不夸张地是,这场革命,从 34 年前的情况看,其重大意义,就在于它拯救了一个民族,拯救了一个国家,拯救了一个政党。

目前在中国,不论改革还存在多少不足、缺点和问题,都不能改变它已经取得的怎样说都不过分的伟大成就,即改革的最大红利。改革中存在或出现的问题,只能用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。如今,任何一位有良心、有理智的人,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,都会切身感受到,我们今天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,是中华民族 5000 年来最好的时期。

其二,如何实现今后 10 年或 30 年“改革红利”的最大化?

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,今后的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,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。什么



是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呢?按照十八大规定,在一定时间内,实现 5 位一体的改革,即实现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和生态的全方位改革,保质保量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我想,为了把问题说得更直接些、更明确些、更具体些,是否可以换个角度用哲学的思维来进行考虑?今后 10 年或 30 年要实现我们改革的预期目标,即实现“改革红利”的最大化,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,必须稳妥地逐步解决以下 6 个方面“大与小”的矛盾,或者说处理好以下 6 个方面“大和小”的关系。

一是大政府和小社会的矛盾。大政府不仅是指政府机关庞大,机构臃肿,密密麻麻、层层叠叠,像钢丝网一样,捆绑着大地,消耗着大地,而是指政府的权力过大,管得太宽,

该管的管,不该管的也管了,束缚人民的手脚。比方说,在农村,农民合理合法使用的土地,应当有自己的承办权、租赁权和转让权。近年来,因经济高速增长,城市面积大幅扩张,有些地方政府,为了获得政府利益,强行把一些农民对土地的转让权甚至使用权都剥夺了,因而在农村产生许多政府与农民的纠纷,有的地方,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。。

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,必须健全和强化法治,在社会领域内,政府管自己应管的事,尽量少管,其余的让社会在法治范围内,利用社会的力量,包括组织的力量,实行自我调节和管理,只有这样社会才有活力。这就是说,政府要“有所为,有所不为,为所当为”。

前些年,国外出版一部畅销书叫《改革政府》,书中认为“多掌舵少划桨的政府才是真正强大的政府。”“要求的不是大政府,而是怎样的政府,要按照怎样的政府,来组建多大的政府”。从总体上说,要使政府“变瘦”、“变薄”、“变精”,能够轻装前进,实现“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”。

具体到我国,政府的改革,历届政府几乎都提出精兵简政的要求,其结果,似乎都陷入了精简——膨胀——再精简——再膨胀的陷阱。2008 年,提出了大部制的改革。大部制改革的原旨,重点是想把职能相近、业务趋同的部门或机构集中起来,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,重点解决机构重叠、人浮于事、政出多门、资源浪费的问题。可是,实施的结果也不理想。原因在于大部制改革必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(或基础),政府职能没有从根本上转变,任何形式的政府改革都是徒劳的。

二是大计划和小市场的矛盾。在社会资源配置上,改革的方向,就是要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,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。可是,经历了 34 年的改革,我们仍

然不难看到,“计划经济”的幽灵,仍在我们上空徘徊着,并经常借“宏观调控”之名,行“计划经济”之实。比如,在地方建设方面,包括城镇建设,国家计划干预过多,影响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。政府对于地方及其企业的发展,要因势利导,不要取代市场。有人说,中国发改委像“小国务院”,其中缘由就是它具有非常繁多的和严格的审批权力,许多地方和工商产业项目,能不能上马,何时上马,都需要得到它的层层审批。这对经济快速发展是非常不利的。

2012 年 5 月,广东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在一个论坛上说:“我调查了 6 个项目,按程序来走,把所有的审批程序走完,需要 310 天,如果企业都这样干,黄花菜早就凉了!”再比如,关于价格改革问题。我们改革已经 30 多年,但在很多领域还是存在价格管制现象,比如城市自来水、居民用电、柴油价格、春运火车票、出租车价格,这些都受到计划限制。还有医生诊疗费的价格管制问题,让很多病人吃了本不该吃的药、做了本来不必做的检查,而且也对医生的心理和医患关系造成很大伤害。

三是大企业和小民企的矛盾。过去十年,国企一扫过去萎靡不振的痼疾,一路凯歌。数据表明,这十年,特别是这十年中的头些年,国企的平均利润率空前看好,超越民企。2011 年,进入世界 500 强的 57 家企业,基本上都是国企,参与海外大宗并购的也多为国企。

过去十年,国企之所以取得这样辉煌业绩,主要是因为,2000 年后,国家为了挽救处于危难时期的国企,实行了三年扭亏的攻坚战略,这一战略的核心是“抓大放小”,战略实施的结果,大批的国企纷纷从下游行业中撤退,有条件的国企在国家大力扶持下纷纷向上游产业,从而更加强了国企在上游产业中的垄断地位。

[紧转 02 版]

## 专家观察

## 当今中国消费的几个基本特点

■著名经济学家、经济学研究员、教授 管益忻

在调结构、转方式、惠民生的推进中,上上下下都比较易于达成共识的是这样两句具有重大战略影响的话:消费是基础,投资是关键,突出强调了科学发展、真正稳增长要双管齐下。而本人以为,现在极为重要的一个视角是:要全方位、大视野、大纵深探讨、认识和科学把握今日中国消费特点。

首先应强调的是,必须明了“中国消费”这是一种世界上最大消费群体的消费。不管你同意与否,它正如西方学者所说,十三亿人口的消费决定着世界生产乃至经济全局的面貌;它正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和创新的原始动力。

再者,它是世界上极富特色的“后发式”消费。同经济(生产)上有一个后发展者利益一样,消费亦有一个后发展者利益问题。后发展者同样可以少走弯路,甚至跃过陷阱。大家知道,在 1997 年金融、经济危机冲击之下,相当一部分韩国人的家庭经济被摧垮了,至 2011 年底,全韩家庭债务高达 912.9 万亿韩元(合人民币 5 万多亿元);户均欠债 5000 万韩元(约合人民币 28.13 万元),他们大半破产于住房按揭;老人贷款买房房价大跌还贷难等原因造成债台高筑的教训,值得我们(尤其是种种“房奴”、“车奴”)高度警觉。

第三,这是一种具有强烈储蓄文化传统的消费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是消费上决不搞寅吃卯粮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消费文化,消费模式核心是寅吃卯粮,超前、(超额)消费以至登峰造极——其突出转化形态便是 QE,现已到 QE4 了,美国的全部国债已达 GDP 的 314%了,这绝对是不可取的。我们国内某些人骨子里很欣赏这种模式,这是极端危险的。

第四,这是一种在 960 万平方公里偌大版图上递次展开的消费。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,幅员广阔,生产力从而消费力极不平衡的国家。因此,中国消费事实上在消费结构、消费模式、消费文化等方面一方面沿着一、二、三、四线城市递次展开;另一方面又是由东而中而西不断流动推进的消费,产业是这样转移的。消费也是这样展开的。同时还要注意到大部分人奔小康的一边,还有少部分人要救济,要扶贫。

第五,这是一种直接依据、对接实体经济消费。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,西方国家在总体战略上力求尽快把传统即把实体经济转出,集中精力发展高科技产业,而他结果是吃了亏了,现在他们发现十个帽子有九个是“MADE IN CHINA”时,回过头来急转弯投身“再工业化”。我们不同:高科技弱,但实体经济强;而实体经济多为一般生活用品,正好对接——这正符合十三亿人向小康迈进之要求。

第六,这是一种依随新型城镇化推进而发育的消费。据统计显示,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,大概能带动 7 万亿元的市场需求。

第七,这是一种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消费。作为发展中国家,我们的消费,不少产业处在全球化价值链低端,与之相对应,我们的消费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会物质性部分大。而在全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大背景下,我们的产业结构正在逐渐向高端演进。欧洲专利申请局长认为,五年之内,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将超过当前的 2—3 倍中国,他预计中国于五年内有可能从“世界工厂”转变为全球的“研发中心”。这就标志着中国人的消费水平、生活品质——特别是消费品非物质部分将随之大大提升。

第八,这是一种处在全面小康前夜的消费。从世界视角上看问题,我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仍然很低,2011 年我国最终消费 22.47 万亿(合 3.48 亿美元)相当于美国最终消费支出的三分之一。同时,像社保、医疗、教育等负担还极大制约着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信心。十八大给出的一个重要的奋斗目标是 2020 年经济收入要倍增,全面实现小康。第一次把民生、民众的实实在在的消费即生活本质当作了奋斗目标。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,不是吃饱穿暖型的温饱目标的数量型增长,而是吃得更好,穿得更好,住得更好,目标更高的——价值型增长之实现。



## 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 “财经战略年会2012”在京召开

■周新军

日前,为贯彻落实“十八大”会议精神,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“财经战略年会 2012”在京召开。本次年会以“十八大后的中国: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”为主题,组织经济领域专家学者对当前和今后的重大财经热点、前沿问题进行评述、解读。国内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了本次年会,专家阵容强大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、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。

本次年会分主题发言和专题发言。在主题论坛上,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、审计署副审计长石爱中、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宋宏任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张伟、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先后作了主旨发言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主持了主题论坛。

专题发言分为深化体制改革、实施创新发展战略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、提高开放型经济和建设美丽中国五大部分。

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贾康,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、财经学院院长高培勇,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、教授白重恩,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常

修泽,辽宁大学校长、教授黄泰岩,东北财经大学校长、教授李维安等专家学者参加了“深化体制改革”的研讨并作了精彩发言。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与发展战略部部长、研究员侯永志,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院长、教授陆勤毅,中国社科院财经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员倪鹏飞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、研究员刘迎秋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、研究员冯飞,山东财经大学党委书记、教授邵书辰,南京审计学院院长、教授王家新,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小兵,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校长侯岩,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副院长曲永義等专家学者参加了“实施创新发展战略”的研讨并作了精彩发言。

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员张立群,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、教授朱有志,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、研究员马晓河,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研究员梁启东,浙江工商大学校长、教授张仁寿,中山大学第三产业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李江帆,中国社科院财经院院长助理、研究员夏杰长等专家学者参加了“加快经济结构调整”的研讨并作了精彩发言。

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裴长洪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、研究员隆国强,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、研究员张燕生,商务部研究院院长、研究

员霍建国,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、研究员曲伟,上海金融学院院长、教授储敏伟,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员冯雷,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张宇燕,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、研究员吕余生,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、教授赵忠秀,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白景明,广东商学院副校长、教授于海锋等专家学者参加了“提高开放型经济”的研讨并作了精彩发言。

清华大学前副校长、教授何建坤,中国社科院城环所所长、研究员潘家华,中国社科院农发所所长、研究员李周,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、教授叶泽,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、教授廖进球,江苏大学副校长、教授田立新,海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、教授赵康太,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雷仲敏,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、研究员史丹等专家学者参加了“建设美丽中国”的研讨并作了精彩发言。

据悉,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组建于 2011 年 12 月,其前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院。财经院致力于“全局性、综合性、战略性、前瞻性”财经领域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,以建设“国家级学术型智库”为己任。

(本报将选择部分专家的发言陆续刊登,敬请关注)